

励耘文库

王汝

Wang Rubi Juan

聂石樵/编选

辑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大学出版社

励耘文库

王汝弼

Wang Rubi Juan

聂石樵/编选

卷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王汝弼卷/聂石樵编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1707-9

I. ①中… II. ①聂…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49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14.25
字数: 17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郭瑜 齐琳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 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功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

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前 言

王汝弼先生，原名王绍通，又名闻夫，汉族，河北省藁县人。1910年生于藁县富有的家庭，卒于1982年。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自幼好学，1929年入河北省通县师范学校读书，1929年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当时北平师大名教授很多，他师从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诸先生，在学习上受到很好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献和古文学的基础。1935年毕业后，在河北省立新集中学任国文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他参加了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联络工作。1939年出于抗日热情，由天津去大后方云南，执教于云南宣城师范学校，同时组织学生出壁报，引导学生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北平之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城固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当时许多名教授都集中于此，如黎锦熙、谭介甫、吴世昌、杨晦、杨向奎等，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阵地。由于黎锦熙先生的邀请，他由云南去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执教，任讲师。1942年提升为西北师范学院的副教授，又兼西北大学的副教授。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由陕西迁至兰州，他继续任职该院国文系副教授，并指导文谭会会员整理国故，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之初。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次年，即1946年北平师大复员回北平，他也随学校返回北平。从此到他过世，一直任职于北平师大，历任北平师大国文系副教授，并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改国文系为中文系，他又任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民盟北京师大区分部中文系小组长等职。

王汝弼先生与北京师大其他教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毕业于北京师大，并始终执教于北京师大，他的学问具体体现了北京师大的学风，即朴实、深厚，对声韵、文字、训诂、经、史、子、集都具有深厚的修养，这源于他的师承，是他对老师学问的直接继承。尤其对高步瀛先生，他心慕神仪。高先生一生执教于北京师大，把全部心血贡献于北京师大，他对待课堂教学特别认真，凡上课都撰写有详细的讲义，如《先秦文举要》《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史记举要》《辞赋举要》等，这些讲义与一般笈

释或叙述不同，而是经过参考诸多资料、细心研究撰写成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在学术界是有定评的。王汝弼先生教书同样如此认真，每讲一门课程，都印发自己撰写的讲义，如《历代韵文选注》《汉诗选注》《魏晋南北朝诗选注》《唐诗选注》《宋词选注》等，笺释过程中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追溯上古字书之文，以识其字，旁通诸子百家之书，以证其义，也很有学术价值，非一般讲义可比，是高步瀛先生学风之嫡传。当时仅是蜡版油印，未曾出版，而今已很难见到了，十分可惜！

王汝弼先生的学术成就，亦如他的老师高步瀛，主要表现在对古书和文学作品的疏证和笺释上。他早年曾著有《离骚笺证》《九歌笺证》《汉魏六朝唐宋诗笺证》《屈赋发微》等，其中除《屈赋发微》六篇中之部分章节发表在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外，其他都是手稿，未曾刊印发表。新中国成立后著有《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乐府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与聂石樵合撰的《玉谿生诗醇》（齐鲁书社出版），学术论文有刊载于北京师大出版的《爱国主义与文学》期刊上的《发扬〈诗经〉〈楚辞〉中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等。另外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之旧体诗二百余首，编集成册，名之曰《支离草》，取意于杜甫诗句“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是手稿，未曾刊印。王汝弼先生对诗文之笺释，显示出他读书之“精”与“细”，斟酌词句，考稽史事，往往能阐发出诗文新的内涵。如对古乐府《战城南》中“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的解释，历代很有分歧，王先生笺释云：“梁字上可能有‘乘’或‘架’字的脱文。‘乘’或‘架’梁筑室，与下文‘禾黍不获君何食’一气贯注，都是农民在家乡常做的两种活计。《诗·豳风·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一年之计在于春，这都是古代农民家庭必须由男人担负的繁重劳动，但由于他们被征，从军在外，所以这些工作也就自然搁置起来了。”并征引《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穷兵黩武的结果，不但使农民缴纳不上租税，而且有些县份，还要朝廷开仓赈济，影响所及，不仅农民缺吃少穿，最终还要使国君的口粮也失去了保证。既训释词语，又参证历史，使诗意更其显露。又如对乐府《有所思》中“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两句之笺释云：“用物以表心。表心不能无物，但物即使是瑰宝，也总是有限的，而人的深情则是无限的。《诗·卫风·木瓜》篇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又《古诗十九首》有一首：‘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枝折其荣，将以

遗所思……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和此诗所表露的思想情感基本一致，可以用来做这两句诗的最恰当的注释。这两句诗，不仅是写了赠物，而且也写了钟情。玳瑁簪已很珍贵，又缀以双珠，还感到不满足，又用无数的美玉把它镶嵌起来。这里是贯穿着一缕热情的‘丝’线的。繁钦《定情诗》说：‘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明显是读过这首诗并对此诗作者的寄兴深有体会的，可以用来作我们对此诗理解的参考。”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于诗句讽谏极熟，于诗意讲贯极精，笺释得深入、透辟至无以复加的境地。以上诸例，皆见于他的《乐府散论》。

王汝弼先生的代表作或称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是《白居易选集》，此书是他用十余年的时间完成的，倾注着他大部分心血，是目前有关白居易诗文最好的笺注本。白居易的诗文以浅显著称，一般人认为容易读懂，似乎不需要多加笺注。其实这只是就字面而论，对其透过字面的深层含义并不了解。王先生在书的序文中说：“如原文浅显易懂，则仍用原文，而附注其难字难词……亦有原文虽若可解，然不注则无以尽其丰富的含义者，亦加注……白诗多用口语，注时不仅要知其含义，还要尽可能和现代汉语沟通，因而也适当地运用了训诂学上的音训原则，以免臆造。”这段话即针对仅就字面论者而言的，他是要通过对难字难词和口语的笺注，阐发白氏诗文之深层含义。但王先生在序文中未加说明，而在实际工作中做的，即他不仅注释词语，更注释典故和历史，白居易诗文字面通俗易懂，但关涉到很多唐朝的典章制度和历史，在这些方面不加注释，仍然不能彻底阐发其诗文之内涵。王先生对历代典故掌握得极其丰富。对唐代历史也极其熟悉，因此笺注白氏诗文穷源竟委，详细周密。如对《杜陵叟》中“岁种薄田一顷余”的笺注云：“这是反映中唐均田制基本破坏后幸存的少数中人之家的耕田面积。《旧唐书·食货志》：‘武德七年(624)，始定律令：丁男中男给一顷(百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所以杜陵叟虽能种田一顷左右，而所承受在世业则不过二十亩。”以史书记载当时的田亩制度准确地说明杜陵叟“岁种薄田一顷余”。又对“急敛暴征求考课”一句笺注云：“唐代最高统治者制订一种定期对官吏考核成绩的办法，名叫考课，京官由吏部考功郎中、外官由员外郎主其事，实际上是考查他们是否胜任剥削和压迫老百姓。《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七年五月庚申，上谓宰臣曰：卿等累言吴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回，言不至为灾，人非甚困。李绛曰：臣得两浙淮

南状，继言歉旱……御史非良，或容希媚，此正当奸佞之臣……’这件事发生在白氏写《新乐府》以后，可见当时这类坏人坏事，层出不穷，诗人所说的‘急敛暴征求课’，不仅可以出现在地方官身上，而且可以出现在皇帝所派遣的钦差大臣御史身上，则情况之严重，可想而知。”此以史事阐发诗句之内涵，以史证诗，增强了诗歌内容的确凿性。举以上诸例，以赅其全。王汝弼先生对诗文之笺释大都如此。其察之也精，则释之也密，毛举栴剔，细入无间，用力之勤，犹如前人之治经史的精神。

王汝弼先生在笺注和研究工作中，特别推崇《文选》李善注、《三国志》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因为这三家注文为考据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如李善注征引群书 23 类，1689 种，从经史子集、文字训诂到佛经皆有，历来史家对其有“淹贯古今”的评价。《三国志》裴松之注征引书 159 种，注文约 50 余万字，注文在于补缺、备异、惩妄、辩证，并将三国两晋时代研究三国历史的成果纳入注中，反映了当时的史学水平。《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以增补史料为主，征引古书达 395 种，以纠正原书的错误，但多已亡佚，因此刘氏的注文在保存史料方面有很大贡献。他推崇这三家的注文，自然在精神上与他们契合，他们的笺释方法与路数必然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他对《文选》李善注特别熟悉，这与他的老师高步瀛曾著《文选李正义疏》有师承关系。他笺注诗文即在吸收前人及其老师的学术传统之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学术风气而有所变化，收集史料取精用宏。这种学术路数皆见之于他的笺释和研究工作之中。他特别重视前人对古书的笺释，目的在希求对经、史、子、集透彻的解读，阅读时兴致所至，往往忘记了疲劳，一部极其烦琐的《皇清经解》，他竟认真地点逗了两遍，这种读书精神，是今人所罕见的。

除了教书、科研工作之外，王汝弼先生还参加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他培养青年教师，重在指导研究方法和治学道路。青年教师研究《楚辞》，他要青年教师将《楚辞》与《诗经》同时阅读，比较两者在内容、艺术上的异同，以见《楚辞》比《诗经》有哪些发展，同时要青年教师阅读战国诸子百家之作，以见屈原思想与当时学术思想之联系及其特殊成就等，收到很好的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古典文学教研室共招收了三届研究生 15 人，当时的培养方式是教研室集体培养，王先生为研究生讲课，开列阅读书目，指导论文撰写，倾注了很多心血。

王汝弼先生这部《乐府散论》在著述历程上与他的其他著作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首先对汉魏晋南北朝乐府的产生、演变、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提

出了一些与先贤不同的新见解。对此书的写作目的：“是在想进一步探讨一下乐府诗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不是作选注，因此所论篇目不限名篇。……选取一些笔者认为有问题需要探讨一下的具体篇目，大体按照《乐府诗集》编排顺序，挑选一些重点，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个人的看法。”因此名为《乐府散论》。

如其对《汉饶歌》的解释，在概括前人旧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说：“‘饶歌’的本意，当即‘杂曲’的异称。知之者，《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末，京都童谣云：‘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饶。’此处的‘饶’字本义不是乐器，而是杂乱的意思。因此《五行志》下文解‘后年饶’说：‘陈寔被诛，天下大坏。’正是因为这样，应劭《风俗通》引此作‘今年尚可后年饶’”。饶，抑或叠言称“饶口”。《孤儿行》“里中一何饶口”，亦杂乱之意。由此可见，“饶歌”并非因乐器而得名。况且把内容各不相同的歌曲，使用一种乐器托腔伴奏，亦使人难于置信。解为“杂曲”，则此疑可以涣释。

又如对“饶歌”中《上邪》的篇意，自清代庄述祖《汉饶歌句解》认为“《上邪》与《有所思》当为一篇……叙男女相谓之言’的说法，后人多附和之。”王先生则认为：

①庄说按之两篇具体内容，取譬不同，归趣亦异，实在令人感觉对不上口径，其说非是。

②考《史记·功臣诸侯年表》引《封爵之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

③细察文意，似汉高祖刘邦封功臣为诸侯时，曾经对他们发过“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四句誓言。开国皇帝虽然做过这个誓言，则揣情度理，臣僚不能不作出反应，而这首《上邪》，不是最有针对性的赓和之辞吗？……《上邪》并非紧排次于《有所思》之后，所以庄述祖的说法，是缺乏内证和旁证的，不足信据。

全书选录需要探究的乐府诗140余首，对其中之疑难问题，善能鉴别其真伪然否，博辨纵横，归于至当。对奇词邃义，穷探冥索，使文义豁然开朗。这显示了王先生治学之宏通博精，采摘之丰富，剖释之入微，诚为高步瀛先生学术传统的传承。这是一部功力极深，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王汝弼先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专心致志于教学、科研工作，无声无息地为北师大中文系做贡献。但他大半生的学术经历并不顺利，“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带给他的精神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后，形势大好，然他已经年迈多病。住进北医三院后，我去看他，他还说：“我要回学校，写我的书。”未料到自己已经不能回学校了，于1982年春节与世长辞。“已断燕鸿(王先生是河北人)初起势，更惊骚客(王先生是研究楚辞的学者)后归魂”(李义山《赠刘司户蕡》)。但他的学术经验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

聂石樵

目 录

乐府散论/1

附录一 发扬《诗经》和《楚辞》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167

附录二 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180

附录三 《白居易选集》前言/185

附录四 论李清照/201

乐府散论

前 言/3

鼓吹曲辞/18

 汉铙歌 四首/18

横吹曲辞/26

 梁鼓角横吹曲/26

相和歌辞/52

 相和曲/52

 平调曲/67

 清调曲/74

 瑟调曲/79

 楚调曲/101

清商曲辞/104

 吴声歌曲/104

 琴曲歌辞/118

 杂曲歌辞/119

 杂歌谣辞/139

前 言

我写这本《乐府散论》，主观的愿望是想探索一下汉魏六朝乐府诗有关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时期的乐府诗中，保存了大量的民歌，从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实践，传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上薄风骚，下开唐宋，是这一个时期诗歌的精粹部分。个别篇目如《焦仲卿妻》《木兰诗》等长篇叙事诗，写人物则高风跨俗，飒爽英姿；出辞气则绘形绘声，惟妙惟肖。是祖国古典诗歌的瑰宝，是世界文艺琼林的奇葩。因此，在解放前，特别是在解放后，学者专家对此多有论著阐发，取得了可喜成绩。不过，同时也必须看到，古典文学的整理总结工作，也如对其他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一样，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更艰巨更光荣的任务还摆在我们的前头。譬如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文学现象，尽管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但总应当作为我们今后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而应当勇往直前，继续前进。

这本小书，只是想把平素阅读汉魏六朝乐府诗所发现的一些问题，而又为发表过的这方面的论著所遗漏，或认为解决得不够圆满的地方提出来，进行点滴尝试性的探索。例如：一、乐府诗与乐府的关系问题；二、乐府诗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三、乐府民歌与文人所作；四、从乐府民歌中吉光片羽遗存，看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卓越贡献。

下面我想就这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乐府诗和乐府的关系：按照形式逻辑，必须先有乐府，然后才有乐府诗，这在推理上似乎是无可非议的。而许多专家的论著，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出发点来阐明二者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稍一深入实际，就知道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尽管乐府诗的命名，必须以乐府机关的设置为前提，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另一个方面，即封建王朝乐府机关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采诗合乐，而诗与乐的兴起，却与乐府机关的设置并无依赖关系，而且遥遥领先于乐府机关设置之前。《吕氏春秋·古乐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王念孙《读书杂志》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谓“玄鸟”当作“玄身”，“身”与“民”韵。）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

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里所说的“八阙”，实即指古诗八篇。虽其具体篇目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烙有出于后人增饰的印记，但其“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叙述，却透露了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歌、乐、舞三者合一，则颇符合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情况，那时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到了虞舜时代，据《尚书·舜典》说：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既谈到诗歌，也谈到声律，而且谈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也是指的诗乐配合问题。当时也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到了周朝，旧史中就出现了采诗合乐比较详细的记录。《汉书·食货志》：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男女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公羊传》宣十五年何休《解诂》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据《方言》载刘韵《与扬雄书》知班固、何休所述为周秦时事。更进一步说：这些记载，实际是在描述《诗经》的风诗采访收集过程）

上引这一则历史文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男女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何休《公羊解诂》作“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大旨与《汉志》相同，而内容更加明确）这是乐府诗的最精粹部分，是民间歌谣的主要内容，是这一诗体被人喜爱的决定性因素，但仍是遥遥领先于汉朝乐府机关的设置而独立存在的。二是“献之大师，比其音律”，这里所说的“大师”，实际上就是汉朝乐府令或协律都尉的前身，他们也必然要有一个办事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设置是为了采诗配乐。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前者依存于后者，而并非后者依存于前者。由此可见，乐府诗的最精粹部分民歌，源远流长，在乐府机关设置之前，早已独立存在了。即使在乐府机关设置以后，最高封建统治者虽然也让一些御用文臣搞一些郊天祭地，宗祀祖祢的作品，但这是为了“以神道设教”，欺骗愚众；他们自己实际上并不欣赏这一套。至于他们自己所欣赏的，也仍然是由各地方采访来的民歌民谣。关于此点，《汉书·礼乐志》给我们提